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5.05.07
责编:赵丽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听聋平等』视域下的人伦亲情与惊险叙事

——电影《不说话的爱》评析

■ 文/张卫

电影《不说话的爱》以“哀民生之多艰”的中国现实主义文艺传统观照听障人的生活困苦和人伦亲情,通过诈骗团伙胁迫聋人犯罪的惊心动魄,引发观众心系他们安危,由此增强了本片作为类型电影的叙事吸引力,同时呼吁了健全人和听障人的平等相处与彼此沟通。

影片通过陌生化手法让大多数观众通过“视角对换”,站在聋人的视角和立场上理解聋人,理解他们看待健全人的眼光,笔者第一次知道了聋人听障族群将健全人的世界称之为“听人界”,将自己的族群称之为“聋人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中重度听障人士有4.3亿人,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23年统计,中国中重度听障人士有2780万人。通过这部电影,笔者第一次意识到:尽管政府给了聋人界各种关怀和帮助,颁布了各种平等对待聋人的政策法规,但我们“听人界”有时候依然在无意识中,因聋人的表达不畅,而忽视了他们的各种需求,甚至对他们产生误解。我们听人界还有人对聋人歧视、欺骗、压迫和剥削,并且胁迫他们犯罪,甚至借他们无法发声、无法给自己辩护,给他们强加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聋人对听人界有时候是惊恐的、担心的,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往往“见人先笑”,这是他们自我保护机制的第一神色,这也是本片中听人识别聋人的第一表情特征。

影片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背景和人文观照下,建立了聋人父亲小马与听人女儿木木的人物塑造和人物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关于聋人的惊险叙事和吸引观影注意力的叙事动力。主创首先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张艺兴饰演的小马与李珞桉扮演的健全人女儿木木的温暖情深和相依为命,张艺兴用眼神、表情和手语表达了聋人父亲对女儿无尽的慈爱,特别是妻子因与他无法沟通,抛下他们父女扭头而去后,他承担起为父为母的双重责任,为了不让女儿因母亲离去造成心灵创伤,他想方设法逗女儿开心,输送给她各种心灵温暖,木木既会聋人手语,又懂听人语言,一脚踏在听人界,一脚踏在聋人界,她来回穿梭,成为父亲在听人界谋生的中介和翻译,父亲也是她唯一的生命依托和幸福之源。父亲理解女儿在两界之间穿梭的撕裂和痛苦,努力用听人的方法与她呼应并沟通,他假装听见了女儿的笛子吹奏,甚至对她的演奏打起了拍子,他用吹发声器的办法与女儿做声音的心灵沟通。

观众对父亲的深爱和女儿乖巧懂事十分感动,认同了这一对父女的情感共同体,希望他俩努力建构的温情暖房常在、幸福交融永固。然而类型电影的叙事宗旨就是打破平衡、制造悬念,引发观众的继续关注。于是乎,威胁这个情感共同体的第一个危险到来了,木木到了上学的年龄,妈妈要带女儿去上学,小马不愿前妻带她走,爸爸开始了保住女儿的一切努力,认同这一情感共同体的观众也担心他们父女分离,把自己投射在小马身上,在潜意识中与小马同呼吸共命运,关注父亲为保住女儿所做的每一次努力,与父亲一起跨越保住女儿的一道又一道难关:前妻不是要带女儿去上学吗?我自己也能送女儿上学,女儿入校前面试因认生不说话,学校拒收,观众为此焦急万分,父亲想方设法终于让女儿在最后时刻背出了唐诗,因此被学校录取,观众如释重负。前妻告小马无经济能力抚养女儿,小马就到处找工作赚钱,每到一个工作岗位,观众就希望他能在这里克服听障困难最终完成工作任务,关注他在听人工作岗位上的每一次与听人沟通的工作细节,担心他因听障造成工作失误,每一次失去工作观众就为他扼腕叹息,同时希望他找到新的工作。爸爸能不能保住女儿的行动始终是吊住观影吸引力的悬念,后来父亲为了获得保住女儿的充裕资金,在犯罪团伙的欺骗胁迫下骗保撞车铤而走险,每一次撞车都让观众心惊肉跳,最后一次在拟将车辆彻底撞毁的预谋行动中,女儿竟然尾随父亲上了车,车毁人亡的可能性结果让观众揪心捏肺紧张到心理极点。在这里,“生之本能”成为牢牢抓住观影注意力的主要的叙事动力,编导在这个环节上延展了女儿跟随父亲上车,以及上车后在前排驾驶的父亲全然不知的惊险悬念,依然提速向迎面驶来的车辆撞击,此时此刻叙事达了第一个惊险高潮。

千钧一发时刻,木木拉扯爸爸,爸爸紧急转向,父女侥幸保住了性命,但父亲将女儿留在身边的希望因此破灭,骗保作案也暴露,小马被送上法庭。观众此时产生了另一个担心,担心父亲的形象在女儿心目中轰然倒塌,担心木木的心灵因此受到伤害,木木在法庭上发出“我爸爸不是坏人”的呐喊让观众心痛……木木在法官面前被迫选择跟随妈妈,虽然身体进入到听人界,但因想念爸爸,她从此不说话,在精神和心理上返回了聋人界,此时编导制造的悬念是犯罪团伙诱骗爸爸承担所有的罪名,观众担心木木的爸爸被法庭重判,爸爸因此成为女儿永久的心灵创伤。为解除观众的担心,故事设置了犯罪团伙中阿梅的反转,终于让爸爸得到了昭雪,“我爸爸不是坏人”的呐喊终于得到了法律认可。好人得好报的结局最终满足了观众愿望,本片作为类型电影与观众进行了完整的互动。

影片的叙事成功还得益于人物刻画与塑造的栩栩如生,这来自编导和演员的共同努力。本片演员张艺兴在塑造角色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他表演聋人,不能用台词作为刻画性格的重要手段,作为非语言表演,他只能使用眼神、表情、动作和手语。由于影片所具有的平等对待聋人和听人的立场,他的表演要同时诉诸于聋人和听人两个观众群,他的手语必须准确且生动。与此同时,由于该片具有作品媒介介入现实生活的责任属性和类型电影吸引观众的商业属性,所以他的表演被赋予了现实质感和类型电影动作表演的双重要求。在人物的现实逻辑刻画方面,他表演出了作为父亲爱女儿胜过一切的父爱如山,为女儿不惜牺牲一切的坚定执着,以父代母的细腻耐心,眼神交流的情感递进;表演聋人,他要表演“聋人”父亲对“听人”女儿无声的爱,还要表演“聋人”在与“听人”交流时出现的表述不畅以及由此产生的焦急、忧虑和困惑,表演自己对听人社会诈骗集团的不解和疑虑;作为类型电影主角,他要表演动作主角的铤而走险与果敢坚毅、呈现焦急愤怒的强烈爆发。在影片的表演的全过程中,他既有温情脉脉的轻表演,又有情节高位频率上的强表演,正如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王春子所评价的,“其情感表达既克制又浓烈”。这诸多表演特征的有机融合,呈现为学者厉震林所说的“况味化表演”,这种“况味化表演”呈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内涵意味深长。

为了表演出主角的质感,张艺兴每天跟着手语老师练到后半夜,并且跟同戏中的聋人演员一起生活、一起排练,学习更为丰富的手语表达,这种耳濡目染,使他了解到小马的克制和沉默是他习惯了的生活方式,是他在漫长生活中磨练出的坚韧。张艺兴试着长时间堵住耳朵,觉得视觉的感官注意的集中度被放大了,真正有一种用身体去感受、去思考的能力,不是去演他,而是自然流露出角色的内心世界。为了与儿童演员搭好对手戏,他在进组前每天与小演员李洛桉生活在一起,建立起自然亲密的情感关系。张艺兴用这些方法逐渐孕育、积累起聋人角色和父亲角色的真实质感。在质感的基础上,他又用体验式表演呈现复杂的细腻情绪锚点。例如当法庭问木木:“你是想和爸爸在一起还是想和妈妈在一起?”张艺兴表演出小马的眼神表情充满了期待和担心,面呈微笑同时神色凝重,生怕自己的期望落空。为了不给女儿施加压力,他还故作轻松地勉强一笑,让女儿随意选择。当木木选择跟妈妈,他的表情先是惊讶、意想不到,紧接着是焦灼、绝望,心理的外在表现在很有层次地逐渐递进;当女儿跟妈妈前往机场,在玻璃墙外面的小马疯狂了,他动作表演是大幅度的,他拼命地挥动手臂,追随女儿的脚步而奔跑,他的眼睛和嘴巴不断张大,面部呈现了强烈的悲痛和急切,无法接受女儿离去的崩溃情感强烈爆发并失控。正在这时,故事情节再次出现了剧烈突变:便衣警察突然扑上来将小马按倒在地,这时候他一方面为了自己与女儿的交流被打断而愤怒挣扎,另一方面又为女儿看到自己的身体被压制而尴尬,进而为女儿的看到这一场景时哭喊而感到痛苦和无助……张艺兴将多重心理揉和成具有穿透力的情感瞬间,表现出于角色融为一体的共情力。

《不说话的爱》在生动朴实的聋人生活和惊险曲折的类型故事中歌颂了无声世界的人伦亲情,也让我们深刻反思了心理冲突的社会诱因,进而传递了爱的温暖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向阳·花》:创作的勇气和暮气

■ 文/虞 晓

冯小刚导演以勤奋多产和类型丰富而著称,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导演之一,他近年来的作品往往会引发不小的争议。《向阳 花》也不例外,在有观众表示被震撼和感动的同时,也有人批评影片消费女性、情节尴尬,搁置那种情绪化的偏执立场,从电影叙事的维度,不难发现影片中共存着创作上的勇气和暮气。

新题材与新视角

《向阳 花》改编自作家虫安的小说《教改往事》中的一则短篇,讲述了一组刑满释放的女囚犯在困境中顽强求生的故事。直接描写监狱生活,聚焦女犯群体的电影作品,除了谢晋的《女儿谷》(1995)和刘礼贤执导的《心安河的琴声》(2006),在国产片的阵营中极为少见。冯小刚对这个新题材的处理可谓简洁流畅,既快速搭建出了彼此情感关系的骨架,又填进了有血有肉的质感。比如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在特殊环境中成为了稀缺资源,高月香为黑妹“骗”来的两颗糖、邓虹借生日的名义为女犯们改善伙食、胡萍分享给狱友的剁椒酱等细节,承载起了推进叙事、刻画人物和表达情感的功能。

有了扎实的铺垫,人物之间的情感/行为变化才会合理自然,在监狱里黑妹帮高月香两次打架,从被动的帮手到主动的出手,心理变化的轨迹清晰可信。打斗是《向阳 花》中反复出现的情节,从挥拳而上到拔刀相向,冯小刚并不是借此要打造监狱/暴力的“奇观”,而是一种表达底层女性生存困境的叙事策略,暴力是退无可退时的决绝,是捍卫生存必需时的在所不惜。女性瘦小的身躯(高月香、黑妹)与狠辣的暴力所形成的反差,也带来了视觉和心理的双重冲击,反倒是更高更壮的胡萍,从没有动过手。

高月香和黑妹等人,是冯小刚的创作谱系中全新的女性形象。之前在《芳华》等影片中,他已经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但那些女性形象,要么是辅助达成讽刺官僚/威权的黑色幽默的“工具”,或者是被时代的列车抛出轨道的“精英”回忆旧时的叹息,在不同的程度上,她们都还需要传统父权社会的拯救。《向阳 花》中的女犯们,则是完全被剥夺了社会身份(证明身份的是刑满释放书)、伦理身份(没有做母亲的权利),无法发出声音的(亦真亦假的聋哑人)社会底层,影片用她们自身的视角,书写了一出“自己去争取尊严”、掌控命运的“传奇”。

挑战未知是需要勇气的。正如我们祝福影片中高月香等人直面高墙之外的“新”世界,冯小刚导演在创作中对新题材、新形象和新视角的开掘,也无疑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失准的新生“传奇”

浏览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创作履历会发现,求新与求变一直是他秉持的创作“习惯”,从上世纪90年代“救市”的贺岁喜剧,到新世纪跟风试水的武侠大片,从关注当下人情感状态的婚恋喜剧,到历史烟云中的家国史诗,这些创作中始终有一个基本稳定的“准心”——人和时代、和某些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之间的关系。那些依托于王朔小说的贺岁喜剧,在辞旧迎新之际上演着对旧时代摈弃中的留恋;被“手机”所改变的人和命运,描写了在经济浪潮冲击下爱情的满地碎片;而对家国记忆的重塑,让宏大历史中悲怆的个体显形,也是一个再攀高峰的民族对来路的回望……正是这种时代感,让冯小刚的电影在迎合观众“接地气”的同时,又有着隐隐的、耐人寻味的思考和抽离,让文艺青年和小镇青年都不难从其中找到共鸣和乐趣。

遗憾的是,这种标志性的“精准”在《向阳 花》中消失了,影片把女犯们悲惨的命运统一归结于家庭的原罪,归结于不负责任的赌鬼丈夫、犯罪伏法的毒贩父亲和痛失双亲的弱小孤雏,而这些家庭背后的社会和时代动因却付之阙如,这让高月香和她的伙伴们,仅仅是不幸的个体凑巧组合在了一起,她们的命运并不具备让大多数观众共情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更进一步,在高月香和黑妹出狱之后的叙事中,人物的情感逻辑和行为动力也失去了准度。女儿聋哑让高月香粗通手语,在监狱中她因此承担了与“聋哑”的黑妹沟通的任务,既教她规矩,又替她隐瞒,还给这个“吃够了苦”的孩子找糖吃,二人之间已经形成类似母女的关系。沿着这个情感关系去推进,之后二人的诸多行为才合乎情理,比如高月香被性侵时黑妹挺身而出、明知录视频有风险还甘愿露脸、为救黑妹高月香放弃了与女儿重逢的机会等。缺少这种情感支撑,如前所述的情节转折还显得局促和生硬,难以让人信服。

从电影叙事的模式加以考察,这个向阳“新生”的女性故事已经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主轴,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民间文艺中的“传奇性叙事”。“传奇”意味着叙事包含着非比寻常、跌宕起伏的极致化情节,这些情节往往脱离日常生活的常规轨迹,常用巧合和偶然的方法实现叙事的缝合。

从讲故事的技巧与成熟度而言,《向阳 花》显然与个人印象中的“冯氏水准”还有明显的差距,它缺失了对时代的精妙表达和对叙事的精准掌控,当然也缺少了记忆中的观影快感,所以姑且把它称为创作中的“暮气”。

值得关注的是,继清明档的《向阳 花》《不说话的爱》之后,同样表现聋哑家庭的《独一无二》也即将公映,“聋哑”题材的扎堆,可能印证了一个“古旧”的期待依然有效,中国电影不应该对中国的现实“装聋作哑”。

他们的故事需要让更多人看见

——《不说话的爱》的商业突围和社会价值重构

■ 文/杜 昊

由沙漠导演、陈国富监制的电影《不说话的爱》清明档上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目前影片票房已近1.3亿,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电影凭借着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84.1分以及淘票票9.7分、猫眼9.4分、豆瓣7.0分的高评分,领跑整个清明档的口碑。

这是一部改编自感动百万人的催泪短片,讲述了聋人小马和女儿木木彼此为伴,但随着木木的长大,她必须要融入听人的世界,两人形影不离的生活即将被打破。也正在此时,一个专门利用聋人犯罪的团伙盯上了小马,爱女心切的小马,为了女儿,一步步被骗入了犯罪深渊。

在不久前的影视行业专家学者交流的分享会上,导演沙漠分享创作感受:“电影是传递温暖与理解的载体,希望影片能打破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虽然我们也许存在差异,但彼此的善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这也是我创作这部电影最纯粹的初衷。”

这是一个好的题材,但在很多片方看来,未必是一个好的商业题材,虽然在综艺节目上,互联网上,在短片拍摄完成后,收获极高评价和传播,但当在把短片变成长片的过程中,导演一直都要面对一个问题,这部电影让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动力是什么?如何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和我有关?甚至不让观众觉得这是在消费苦难?很多传统残障家庭题材的影片,经常采用“牺牲-救赎”的刻板叙事,这也很多观众在走进电影院之前对这类题材的预期,但导演在这部电影里的叙事里,并没有消费苦难,展演缺陷,却通过一对父女的视角,展现了聋人群体的自洽的一面。

听障人士在法定事实上是残疾人,但导演并没有没有觉得他们是有缺陷的人,手语是一门独立的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语法,我们和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母语在进行交流。为了贴近真实,导演在拍摄期间,选择了近30位聋人演员合作,并且选择了更民间的自然手语表达,这种与通常电视上看到的手势汉语不同,却是深受聋人群体喜爱的手语,让聋人演员们十分感动,从立意到细节,能深刻的感受到导演对这个群体的尊重,也正是这种平视的视角,让我们发现了聋人群体的情感代码。这也是电影上映后,首先在聋人群体获得好评,不断破圈的一个重要基础。

作为普通观众,能够不断地摘下滤镜的重要原因,是大家共鸣到了一个父亲的对女儿藏在细节里的爱,他更像是一个典型的家庭的缩影,父亲对女儿的爱,是让人向往的范本——虽然家境一般,屋子很小,但是依然摆满玩具,女儿的鞋很合脚,不会总是大一码,为了养女儿,爸爸要打几份工,接女儿时间迟了,被女儿抱怨,他的和解方式是给女儿一个吻道歉而不是解释,陪女儿的时候,永远都不碰手机。爸爸有一些作为聋人的困境,但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他积极的心态,让他把生活的中的太多困难和挑战都抹平了,他作为一个父亲,让我们感受到了正能量的共鸣感。

在过去的清明档中,电影《不说话的爱》的宣发策略也和同期几部电影都有所不同,更早地选择点映,凭借着对内容极大的信心,通过口碑来带动更高的热度,虽然第一波口碑出来,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发在评论区的被泪水打湿的纸巾,有大量哭惨了的评论,但观众讨论更多的,更吸引大家的,是这部电影里的治愈感,以及对父亲爱的张力的体现。

导演在电影里呈现了一个极度民主化的家庭关系,让孩子更早接触到了平权教育,也呈现了一个极度有爱的家庭,虽然只有两口人,但在这个关系里,父女之间的爱,都是注意力全时在线。这是一个特别的家庭,单亲爸爸,聋人爸爸,观众观影前有滤镜非常正常,如果对于这类群体生活中的苦难去着重刻画,确实容易让大家感受到对苦难的消费,但是这部电影让大家的共鸣,恰恰是爱的力量,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单亲父亲在孩子面前,如何维护她的妈妈,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父亲,该如何和孩子相处,我们当下所感动,为之流泪的,不是他的难,而是一个父亲的爱照进现实的部分。

在叙事方法上,导演沙漠也非常巧妙,它没有让这部电影只是一部传统的家庭片,而是引入了聋人犯罪的情节,最终形成“7:3的情感犯罪比”——前70分钟聚焦家庭情感,后30分钟转向悬疑犯罪,通过复合类型,大大扩大了类型受众,但对于这个主题的展现又极其自然和当下,通过一个聋人家庭链接了当下聋人犯罪的社会现实。从这部电影宣发前期放出的宣传语——“命不是底线,女儿才是”也能看出,影片宣发一直在高情绪和高类型的方式下双线并行,这也能吸引到更多的类型片受众。

中国的电影里,一直不缺少对残障群体的呈现,但很少以他们作为主角去呈现一个故事,但在这两年里,随着《小小的我》《不说话的爱》等一些列影片的出现,让我们开始更多的了解到了特殊群体的故事。电影作为一个更快、更有影响力的传递社会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应该在丰富的题材里,也更多关注到他们的生活。中国有3000万的听障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被听到看到和注意到的群体。在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聋人在见到你的第一眼就会对你微笑。它精准还原了这部电影对于这个群体的最真实的态度,也是导演坚定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希望借影片展现人的尊严,构建平等社会,就像主角木木一样在两个世界中搭建起一座桥梁,让说着不同语言的我们都能平等沐浴在阳光之下,让无声的爱在这个热闹的世界被看见。